

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

□ 罗永宽

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三者的结合，方能形成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从而推进该学科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

究，就是历史地研究思想，研究思想的历史，从而在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思想特质方面，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即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主体内容，也是该学科发展的最大增量。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唯有坚持历史、理论和现实三者的结合，方能形成全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维视野，从而推进该学科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本文仅从历史的维度，谈谈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史学在各种学科体系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不言而喻。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是基于如下理解。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域外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土壤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这一命题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是一个理论指导和运用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独特实践上升为科学理论（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与形式），这是一个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历史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对象应聚焦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缘起、进程、脉络、理路、特征、成就、规律及经验。具体而言，以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为参照，以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道路的百年实践为线索，探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成果的理论主题、理论形态、思想内涵、逻辑关联、历史地位、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等，多维度、广视域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境遇、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方法论要义。恩格斯强调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是把握事物本质和特质的必然视界。无论是历史逻辑还

是理论逻辑问题、抑或是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问题，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中的再现。历史逻辑反映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化”中国的过程，理论逻辑体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代化的实现过程。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就是历史地研究思想，研究思想的历史，从而在理解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思想特质方面，体现理论性与实践性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即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

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

相对于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这条“显性的明线”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则是一条“隐性的暗线”。显与隐的交织、明与暗的辉映，方能全景式地呈现这一历史进程，而不是止于概念化叙事和脱离历史文本的理论演绎。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视域、学术视野如何拓展和拓新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之间达成沟通和互动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深度审思和多维观照，去发现经典话语系统背后的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史的叙事显得更加丰富、立体、鲜活。

其一，从思想史背景、学术史的

视域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要注重运用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梁启超说研究文化史、学术史要注重“互缘”，即要与社会史等交互柔缠、彼此作用。胡适强调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在于明变、求因、评判，为此需要材料校勘，参照其他资料融会贯通，寻出一个脉络条理。葛兆光在《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中提出“加法”，即打捞被宏大叙事和历史学家减去的片断，同时要眼光向下，把思想史与法律史、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教育史、宗教史等结合。王汎森说，研究思想史要精读文献，注重语境，把文献放在整个时代的脉络里，深入了解时代词汇、语言、思想的复杂状态，还要有“铜山崩而洛钟应”的思想感应力和“杂糅附会”的学术想象力。

其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的研究理路。需要去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百年间是由哪些主体（群体和个体）汇聚的“合力作用”而推进的，去追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怎样生成的，或者说，是什么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背景或学术史支撑？如何通过寻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尤其是原创性贡献的知识谱系，在厘清理论创新成果的文本理路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和内在机理？这都需要我们增进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学科“史”的关注程度与建设力度，并在“四史”中寻求富有生命力的思想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可持续地深耕细作开展创新性研究，求得规律性认识。

其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和学术史背景，要将这一研究与五四后的中国学术转型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以明辨、印证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探索 and 建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形成的互动和感应，是一个双向涵化、彼此会通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了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在西学东渐背景下逐渐发展的历程，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我们会注意到，五四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致力于传播唯物史观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在论战中是如何初试革命哲学之锋芒的？党的早期理论家参与了哪些哲学批判活动？唯物史观在建党前后是如何广泛传播、辩证唯物主义是如何启蒙的？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尝试用唯物史观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党内的哲学思想分歧是如何对国民革命产生影响的？譬如，透过众所周知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我们可以梳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演生史，追踪何干之、潘东周、王学文、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史，确认论战的成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国情依据，从而彰显学术界的探索及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思想界、学术界的探索 and 建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

新形成互动、感应，这是一个双向涵化、会通的过程。一方面，前者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材料、思想观点和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后者的理论创新成果促进前者进一步地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求索之路跋涉、攀援。

在整体贯通的基础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

新时代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既要整体把握、贯通研究，又要分段寻绎、衔接融通，更要重心后移、聚焦增量。这种研究旨趣或理路，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总结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学理化的历史经验。

首先，注重从“四史”的维度整体把握、贯通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四史”结合起来。“四史”深刻揭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党之路、强国之路、复兴之路，全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



背景和百年进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觉创新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发展逻辑。我们要全面揭示这一历史进程，就要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域、学术视野通过“四史”的观照而加以拓展和拓新，使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的叙述在与“四史”的互参互鉴中显得更加丰富和鲜活。

其次，分段寻绎、衔接融通，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主题和阶段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深入认识中国国情，揭示和掌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 and 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一方面，既要聚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核心范畴，加强对其内涵阐释的深度耕犁，注重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哲学基础、科学内涵、理论特征、内在逻辑、生成规律、思想方法的总结，实现对理论创新成果的全面研究和整体把握。另一方面，可按照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现在的时间顺序，详细分析一系列代表性人物和代表性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艰辛探索和开拓创造的足迹，显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的继续、创新和发展。

最后，紧跟新时代的步伐，把研究重点放到发展历程的新阶段和新飞跃上来。要确立原创性研究、学理化阐释、学科化建构相结合的研究旨趣和导向，全面深入地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广度和深度，如何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之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内在统一性。因此，要加强对这一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及其文化形态的理论渊源、内涵界定、时代出场、逻辑生成、理论特质、方法呈现、历史地位、重大意义等进行整体性研究，建构多种合理有效的逻辑图式，对创新理论的基本依据、生成理路进行深度探究和系统性诠释。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思想中的智慧

□ 商志晓

而没有或缺少智慧的思想，还能为人所需要吗？还能给人以启迪和指导吗？很难设定没有智慧涵纳其中的思想是必要的，是有存在价值的。从智慧这方面看，智慧的寓何在？智慧以何种方式呈现？这关联到人，关联到思想。尽管不排斥动物、植物具有“智慧”特征，甚至大自然亦被视为具有鬼斧神工般的“智慧”，但这种被泛化、广义了的智慧，已超出人的智慧之内涵。真正拥有智慧的是人，人的智慧存在于人的大脑、人的思维及思维成果中，呈显在人的能力、人的行为实践中。

智慧的主体是人。通常理解，智慧是一种超出常人的悟性和超出常态的能力。以悟性看，智慧表现为较强的辨析力、判断力和洞察力。聪明、谋略与智慧虽有联系，却不可相提并论。头脑聪明固然有通达智慧之可能，但聪明并非等同智慧，不能把智慧简单地归结为聪明；人的谋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含有智慧的因素，但谋略尚不能与智慧划一，其中既有片面（谋略多是针对事项）与完整之别，更有是否合乎德性要求之分野。以能力看，智慧呈现为较强的协调统筹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在运行把控、联动平衡、策略实施等方面达至圆满境况，使主体自身具有的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得以有机融合，通过向物态化过渡而真切呈现。智慧联通智力、知识、方法、技能，却并不等同于其中某一方面，而是智力、知识、方法、技能的系统化融会与全面性提升。

如此可见，智慧即人的思维与能力所达到的一种优化境界和优质状态，是人的灵性、人的机能、人的创造综合作用的结果。亚里士多德看重智慧，视智慧为关于高等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有智慧的人是“完善者”。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沉思才能使

人获得智慧，从而获得最高的幸福。秦汉黄石公所言，只有“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方能以待其时，得机而动。这透现的是一种安邦治国的智慧。清代陈澹然曾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唯有“谋万世”“谋全局”，方能成就伟业。这期冀的是安邦治国者应有的智慧。

思想与智慧的关联在于：思想是智慧的寓所，是智慧孕育、生长、展示的家园；智慧则是思想的要素，是思想得以建构、矗立、发挥作用的支撑。思想需要智慧，思想依赖智慧，思想中应该也必然有智慧。思想中的智慧，与思想中的知识、方法、价值有机统一，与思想的知识特征、方法特征、价值特征紧密相连。

首先，思想是知识，是知识的体系；智慧以知识为依托，知识为智慧夯实基础。

作为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成果，思想以客观反映对象为己任。所谓客观反映，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状况予以把握，以求准确实在地阐发认识对象、阐明认识对象的种种联系。因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重要条件”。以知识的面貌呈现，思想所追求的，是认识成果的科学性与真理性。科学性与真理性，既是思想的前置标准，又是思想的建构目标，还是思想能够立得起来并发挥作用的基石。思想的知识特征或知识属性，昭示的是思想的科学追求，是思想的真理旨归。唯其科学性 with 真理性，思想才与智慧联通。

智慧以知识为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知识让我们了解事项、通晓原由，助我们问天究地、预见未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知识或知识欠缺的

人，能够成为一个智者。古今中外的智者，无一例外都是饱学之士；凡是被作为智慧例证和事项的，都以丰富的学识、深刻的见地、精到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为支撑。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力量能在人们的精神和心灵中，在人的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对知识及其作用予以高度推崇。有了丰厚的知识，人的心灵才不会空虚；获得关于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才能插上翅膀。尽管不能说知识就是智慧，不能把有知识等同于有智慧，但只要有了知识的积淀，也就打牢了智慧的底座，由此踏上走向智慧的坦途，在转识成智的道路上续航前行。

其次，思想是方法，是方法的体系；智慧以方法为标识，方法为智慧拓展舞台。

把思想视为知识固然重要，但显然是不够的。仅以反映论的观点看待思想，易于将思想混同于一般性认识。真正体现思想之鲜明特质的，是立足于反映论之上的能动性，是奠基于是理性论之上的创造性。思想的这种能动性 with 创造性，在思想体系中呈现为方法论，聚焦到有关方法的理论思考上。思想的阐发与思想体系的建构，既依赖于方法，又催生新的方法，进而创设出有关方法的理论。故而，思想即方法。思想的方法与方法论，以说明对象“是什么”的知识为前提，着力回答“怎么办”，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是什么”的知识与“怎么办”的方法，构成了思想反映论与思想能动性的两个层面；由“是什么”的知识向“怎么办”的方法的过渡，既是思想在逻辑通道中的提升，又是知识向智慧的接近与转化。

智慧需要方法并依赖方法，智慧在思想的方法论体系中得以充分彰

显。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方法就是智慧，方法最直接、最鲜明地呈现出思想的智慧。从提升智慧的角度看，方法比知识重要，解决问题比认识问题重要。故而，掌握知识是生存能力，获得智慧乃生命境界。人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实质要通过读书提升才慧、增强心智、达至新生。正如荀子所言，“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知”与“智”不同，知觉与智慧有别。我们探究事物，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追求知识与追求智慧，亦如求学与求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其中，既有做加法与做减法的不同，更有方向 and 路径上的差异。要获取了然自如的悟性与解决问题的本领，须“领会言外之意”，洞悉事情本末正误，体察事态缘由走向；须“致虚极，守静笃”，以静制动，宁静致远。这一切，既是方法，又是智慧。思想中的方法，集聚了智慧的精髓，折射出智慧的光彩；同时以智慧为思想加冕，给思想戴上智慧的花环。

再次，思想是价值，是价值的体系；智慧以价值为正名，价值为智慧提供引领。

思想是思想者的思想，人是思想的生产者。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人格属性，思想者不可避免地要把所思所愿置于认识成果之中。任何思想都不只是知识，也不仅是方法，同时是一种价值。思想是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中的价值，呈显思想主体的理想追求，赋予思想以鲜明的价值倾向与价值态度。中华文化理念传承数千年，其探求天道、寻守德性、关注心宁的生存智慧，其“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和谐圆融，始终彰显并赓续着价值的力量。苏格拉底要求人们将紧盯外部世界的目光，转回到人类自身去“认识你自

己”，由此确立的价值指向，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是万物的尺度，思想是价值的承载。思想中的价值成为智慧所倚，为智慧提供必要遵循与基本引领。

智慧必然与价值相牵，价值为智慧正名与褒奖。智慧不同于智力、知识，更不贬身为技能、技巧，全在于智慧是完整的、圆满的、和谐的，是正向的、积极的、优质的。智慧受思想中的价值影响，遵循着思想价值给予的规定，内化为智慧的内在品质。正如我们不能把阴谋诡计、损人伎俩视为智慧一样，智慧的价值规定必须是道德的、正义的、阳光的，必须是合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人民利益的。这就是智慧的德性要求。此种德性要求，包括智慧所依据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理性的，智慧所寓居的方法必须是辩证的、科学的，智慧主体必须是正派自律的、身心健全的。那种虽有知识、有能力但有恶性、有邪气的人，不管有怎样的谋略、怎样的手段，都不能视为智者；只有知识、能力和德性处于同一价值天平上，且达到的境界与实效合乎德性要求的智慧，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智慧。

作为知识、方法、价值的统一，思想孕育智慧，思想奉献智慧；智慧依托知识，融会方法，循从价值，在思想中得到最恰当、最合适的安放。栖身于思想中的智慧，借思想拓开一片天地，闪烁自身独有的光彩。回眸历史，愈感智慧的可贵与尊严。古希腊人视哲学为“爱智慧”，把哲学看作是追求智慧的学问；柏拉图将哲学家称为爱智者，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就是智慧之学，至今仍让我们深受启发。